

李泽昊 著

儒家的情怀与担当

—— 胡思敬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儒家的情怀与担当

—— 胡思敬研究

李泽昊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的情怀与担当:胡思敬研究/李泽昊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8. 7

ISBN 978-7-5426-6326-9

I. ① 儒… II. ① 李… III. ① 胡思敬—人物研究
IV. ①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6536 号

儒家的情怀与担当——胡思敬研究

著 者 / 李泽昊

责任编辑 / 殷亚平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17

书 号 / ISBN 978-7-5426-6326-9/K·469

定 价 / 5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37910000

常州大学人文社科资助项目

目 录

绪论	1
一、选题旨趣	1
二、研究状况回顾	4
三、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9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14
第一章 清末民初大变局中的胡思敬	18
第一节 胡思敬的仕途生涯	18
一、儒学世家	18
二、科举正途入仕	23
三、心系国事	28
四、任职御史	33
第二节 胡思敬辞官南归的历史考察	40
一、胡思敬保守的应变主张	40
二、台谏的兴衰变化与胡思敬的政治表现	44
三、胡思敬离职对时局及其本人的影响	51
第三节 图谋复辟清室	57
一、心怀旧朝、抗拒民国	57
二、胡思敬与张勋复辟	62
三、复辟失败后的胡思敬	71
第四节 致力桑梓建设	75

一、倡捐医局	75
二、创建图书馆	77
三、设立书院	80
四、修缮先贤祠宇	83
第二章 大变局中胡思敬的心态剖析	86
第一节 思想与时代的落差	87
一、保守思想的成因	87
二、对清室“中兴”的企盼	96
三、胡思敬及其保守思想在大变局中的命运	101
第二节 胡思敬的价值取向	105
一、笃守节操大义	106
二、追求“有待而为”	109
三、捍卫纲常伦理	113
第三节 胡思敬的传统文化情愫	117
一、时代背景	117
二、守旧倾向中的趋新因素	122
三、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归与坚守	126
小结	131
第三章 胡思敬的史学活动(一)	134
第一节 胡思敬笔下的晚清政治与社会	135
一、胡思敬与《国闻备乘》	136
二、《戊戌履霜录》中对康有为的评议	147
三、胡思敬与《驴背集》	158
第二节 辑刻《问影楼輿地丛书》	170
一、丛书的主要内容及史料价值	170
二、《问影楼輿地丛书》的编纂特点	173
三、《问影楼輿地丛书》的时代定位	178

第三节 指摘王夫之《读通鉴论》	180
一、胡思敬眼中的王夫之	181
二、《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的主要内容	183
三、《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的史论特点	186
四、小结	189
附表	191
 第四章 胡思敬的史学活动(二)	195
第一节 总结清朝衰亡的教训	195
一、撰述《审国病书》	195
二、编写《大盗窃国记》	201
第二节 编纂整理地方史志及文献资料	202
一、胡思敬与《盐乘》	202
二、胡思敬与《豫章丛书》	211
第三节 胡思敬与近代学人	218
一、早期交谊	219
二、胡思敬与前清遗老	224
 第五章 历史的阐释	232
第一节 大变局下一儒生	232
第二节 胡思敬的治史宗旨与特色	241
 参考文献	251
 后记	262

绪 论

一、选题旨趣

在清末民初社会激烈动荡与转型时期,历史人物的政治立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复杂的分化。与此相应,传统士人的史学活动和史学著述也呈现出多姿多样的状态,不同程度的与时俱进和不同程度的守旧抗新交织一起,构成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缤纷的史学文化风景线。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多注重开新风、领新潮的人物及其史学,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的公羊“三世说”和历史进化论及系统的新史学理论,到以邹容、陈天华、章炳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历史进化与革命相联系提出的革命历史观,再到民国初年陈独秀、李大钊在治史领域的新建树,先进人士不断用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审视历史,促使中国传统史学逐步过渡到近代史学。学者们对这些近代史学光彩夺目的重要篇章向来十分重视,对其研究也历久不衰。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学术界对保守人物的史学与思想的研究则关注得很不够。诚然,历史研究本应彰显新生先进的力量,突出革命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为一代代致力于斯的仁人志士放声高歌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理性的历史研究,如果我们忽视了对历史的另一面,即保守派人物的了解,势必将难以再现复杂多样的历史进程,而有损于我们对历史的全面认识,毕竟,历史的发展是错综复杂的,真实地再现复杂多样的

历史过程,是历史研究追求的永恒意义。有鉴于此,本书选取胡思敬作为一个考察近代中国保守派士人史学与思想的个案来进行研究。

胡思敬(1870—1922),字漱唐,号瘦篁、退庐居士、耶溪憨史等,江西新昌(今宜丰)人,清光绪朝进士。他生平嗜书,著述甚丰,尤其在史学方面,更是成果突出。之所以选择胡思敬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胡思敬是清末民初思想保守的士人群体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清亡之前,他恪守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反对清廷在末年的变法改革;民国后,他不仅拒不入仕,甘为遗民以终老,而且积极图谋复辟清室。在中西文化激烈冲撞的社会变局中,造就了许多像胡思敬这样的人物,胡氏的友人刘廷琛、魏元旷、胡嗣瑗等都与他有着相似的心态。这群人因坚守传统的政治与文化、仇视西方文明、抗拒社会变革而成为历史的绊脚石和时代进步的包袱,在近代化潮流的冲刷下,大多很快被边缘化乃至被逐渐遗忘,而胡思敬则是此类人物中因从事史学活动而取得较大名声的代表性人物。作为一位传统学术素养深厚的学者,他撰写、编纂了大量颇具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的史学著述,为其赢得了当时杰出史学家的名望。笔者认为,在考察清末民初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历程时,保守人物的史学与思想,作为这一阶段史学发展的组成部分,理应择要剖析。胡思敬的史学与思想,在其所代表的这一群保守士人中,具有一种典型性,在中国史学史和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其二,胡思敬是很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但至今为止,尚缺乏应有的研究。人们多鉴于胡氏逆潮流而动的政治思想,对其所撰史书不加重视,这种因人废言的态度显然是偏颇的。因为在传统道德、传统史学理念的指导下,保守人物也会如实揭示一些主要的历史真相。相反,激进的革命人士出于宣传目的,也会写出不实之辞。从学术角度而言,对此两端不应取此弃彼,而要加以辩证的考察和分析。同时,为了全面而深刻地认识胡思敬的历史观、史学思想及撰述理念,有关胡氏的生平事迹、人际交往、思想特征、价值取向及

其与所处时代的关系等问题,都是需要认真研讨的重要内容。然而,以往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较为薄弱,既不系统,也不全面,难以形成整体性的认识,因而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拓展,值得挖掘的内容还很多。

本书选取胡思敬做个案研究,对他的史学与思想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但并非只是就胡思敬谈胡思敬,而是将其作为中国最后一批传统意义的儒家士大夫中的典型代表人物进行剖析,力图通过个体“小历史”的微观视角折射清末民初之“大变局”,同时在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大变革、大转型的广阔历史背景下,深入剖析胡思敬的个性特质及其历史影响,展示一个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形象。近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在西方冲击下大动荡大分化的社会,内忧与外患交加,危机与生机并存。胡思敬生当此时,与那些代表时代进步的人物一样,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表示出深切的忧虑和关怀,只是他的应变思想、方式趋向保守,与时相背。作为一位受旧道统、旧文化所“化”至深的士人,胡思敬自觉地充当了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卫道士。他从事史学活动,既是复旧政治主张无法实现后的不得已选择,也是其坚持保守理念的一种寄托。其一生撰史立说,成绩斐然。在著史过程中,作者将强烈的经世情怀、浓重的民族忧患意识与传统的史学价值担当融入到撰写内容当中。其史学著述可充分反映出作者的史学思想、政治立场、文化心态,且不乏史料参考价值。拙作期望通过对胡思敬的个案研究,能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其所代表的那一群传统士人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现象,揭示其在西学东渐潮流的冲击下的心路历程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前途命运所做的思考,并从他们身上洞悉那个时代的一股脉搏,用另一种视角来解读近代中国的变革,进而对近代史坛错综复杂的形势有更为清醒的认识,也更全面地把握近代社会的进程。笔者不揣浅陋,争取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得出自己的看法,为清理近代史学遗产有所补益,同时也希望对晚清人物研究、思想研究及清末新政研究提供一项实证性成果。

二、研究状况回顾

胡思敬经晚清光、宣二朝，宦海生涯 16 年，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广东道监察御史等职，是当时京城一名较为活跃的学术人物和政治人物。他曾发起成立“访古诗社”，并以出众的诗文水平在京师士林社会名重一时；也曾以为官清廉、刚直不阿，屡次弹劾两江总督端方、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四川总督赵尔巽等权贵而声名大振。然而，由于胡氏具有守旧的政治理念，在历史的新陈代谢中，很快便淡出世俗视线之外。尤其入民国之后，他在拒不入仕“新朝”、积极谋求复辟清室的同时，还辞却了江西省长戚扬的修省志之邀，也不参与民国组建清史馆的修史活动。其撰述、编辑史书，皆为个人的投入，着意与民国官方划清界限。而他的著述多只私家刊刻，并未公之于世，故而流传范围十分有限。这些因素导致在胡思敬去世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对他的研究仅见有三篇人物传记和一篇整理资料：最早介绍胡思敬生平的文章见于其至友刘廷琛所作的《胡公漱唐行状》（闵尔昌：《碑传集补》卷十，台湾文海出版社 1980 年影印本），其后，吴宗慈的《宜丰胡思敬传》（《江西通志稿》，江西通志馆 1946 年刊本）及周维新的《胡思敬传》（《江西文物》，1941 年 1 月创刊号），基本取材刘文，且叙述更为简略。此外，武志平为记述张勋复辟的一些内幕，曾对复辟前后胡思敬致刘廷琛的信函进行过整理（武志平整理：《胡思敬致刘廷琛函》，《近代史资料》总第 35 号，中华书局 1965 年 4 月）。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史学研究逐步走向繁荣。这不仅表现在传统的一些热点课题获得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而且体现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越来越多原先未被关注的内容逐渐进入了治史者的视野。在这种背景下，关于胡思敬的研究也有所进展，其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从史学史的角度，对胡思敬的史学著述进行研究。二、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胡思敬的思想特征及其诗文进行考察。三、从地方史的角度，将胡思敬视为清末民初江西士

绅中的典型代表人物进行剖析。四、对胡思敬藏书、刻书及辑刻《豫章丛书》的情况进行专题探讨。

1982年,《青年史学》在第7期、第9期上先后刊登了朱政惠的《胡思敬与〈戊戌履霜录〉》和《胡思敬的〈盐乘〉——对近代正统派史著的一个剖析》两篇文章(后朱政惠将两文收录在《史之心旅——关于时代和史学的思考》一书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是对胡思敬史学进行研究的文章中极有分量和价值的两篇论文。在《胡思敬和〈戊戌履霜录〉》一文中,作者详细论述了《戊戌履霜录》的成书背景和撰述动机、史学思想倾向、编纂特点以及史料价值和史学地位。朱政惠认为,该书是在戊戌维新运动风起云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其撰述的目的在于力挫维新思潮和变法改良派,以维护清室的一统天下。是书对维新派的谴责、对当时朝廷用人的批评,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维护封建旧制度的地主阶级保守派的立场,表现了其封建守旧的政治思想倾向,这也正是《戊戌履霜录》史学思想的基本倾向。在编纂特点方面,《戊戌履霜录》有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记言专篇以及志、传、表等,是一部融各种史学体裁于一书的史学专著,用这种综合体裁来写历史的做法是应当加以肯定的。从总体上看,这本书所提供的史料是可靠的,史学地位很高。虽然作者对维新变法施之以谤词,但还是较全面地反映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全过程,是反映戊戌维新运动的较成功的史学专著。在《胡思敬的〈盐乘〉——对近代正统派史著的一个剖析》一文中,朱政惠对《盐乘》撰书背景和史学思想、编撰特点和价值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胡思敬编撰此书不仅是因为新昌方志年久散失、残缺不全,而且有其更直接的政治原因,即为清室复辟而努力。整部《盐乘》宣传封建的政治、文化思想,为复辟做舆论的鼓吹,其反对革命、图谋复辟的思想特别强烈。从对是书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胡思敬的政治立场及其思想是相当保守的。他代表了辛亥革命以后一批封建正统史学家所共有的特点,即在记史的同时,寓入他们对近代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的种种看法,借此来反对革命运动和革命史学,是失去了统

治地位的封建阶级的政治欲望在史学界的反映。朱政惠也指出,《盐乘》在编撰方法上有很多独特之处,开辟了方志编写的新格式,如专设氏族志,便很有特色。同时,是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江西和新昌历史的一部重要的参考资料。

对胡思敬保守思想的研究较为学界所关注。王开玺在《清统治集团的君主立宪论与晚清政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围绕实行君主立宪的问题,清统治集团内部官员分化为较为激进的速行、较为平和的缓行和完全反对的三种有代表性的君主立宪论。胡思敬属于完全反对君主立宪论者,这些人死抱着传统的封建体道观不放,认定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一切体制都是至善尽美的,因而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变革。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对晚清政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胡思敬是同光体诗派的知名诗人,有的学者注意从其诗文中剖析其思想。胡迎建在《孤亭兀坐一轩眉——胡思敬》(胡迎建:《近代江西诗话》,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一文中,便从胡思敬的诗中揭示出其忠清室仇共和的情绪以及忧国怀旧的遗老感伤。龚汝富在《略论胡思敬的文化保守主义及其诗文》(《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0期)一文中也同样通过胡思敬的诗文生动地揭示出其思想与心态。作者认为,胡思敬是辛亥革命前后为时论所怪的守旧人物之一,他在政治上追求复辟的遗老立场与其抗拒时代发展的没落旧文化意识,在清末民初颇具典型。胡氏的文化保守主义及其诗文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激荡的新旧文化冲突中,以扶持传统封建名教为己任的文化遗民的共同悲哀。

丰富的《清末江西学者胡思敬》(《宜丰文史资料》第一辑,政协江西省宜丰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版)一文,注意从地方史的角度对胡思敬进行研究。作者首先介绍了胡思敬的生平,进而指出胡氏是一个守旧派,由于受阶级的局限,始终未能摆脱封建意识的束缚,不敢正视现实,投身民主、科学行列。但是,作为清末民初江西士绅中的典型代表人物,胡思敬在隐退以后,潜心著书立说,编辑先哲遗书,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不遗余力,做了大量有益于桑梓的

社会工作。李平亮的博士学位论文《卷入“大变局”——清末民初南昌的士绅与地方政治》(厦门大学,2004年),通过考察清末民初南昌的士绅阶层与地方政治,论述地方社会卷入“大变局”的历史过程,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作者在文章第四章第一节“主要绅士群体的政治取向”中,用了近八千字的篇幅对胡思敬做了具体的论述,把他归入民国初年江西士绅群体的三种类型中的“拒不入仕,甘为遗民”一类,描述了胡思敬在民国以后作为一个前清遗老的心态及种种表现,以及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刘慧的硕士学位论文《胡思敬仕履及其心路历程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05年),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胡思敬一生的主要事迹及其心路历程。作者认为,胡氏终其一生都是忠于清室的,作为清末江西著名的士绅,胡思敬对清末以及民国发生的一切变革恨之入骨,拒绝接受社会的巨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遗老。

胡思敬是近代江西省著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许多学者对胡氏的藏书和刻书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吴祥瑞在《胡思敬与“退庐”藏书》(《赣图通讯》,1984年第4期)一文中对胡思敬的生平、藏书、著书、编书等情况做了介绍。作者指出,胡思敬在刻苦读书、不断著书的同时,全力收藏、购贮图书。尤为难得的是,胡思敬能够把自己数十年积蓄的图书,全部捐赠给当时的江西省立图书馆。此举对于江西省图书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熊步成的《也谈胡思敬——兼与吴祥瑞君商榷》(《江西图书馆学刊》,1986年第1期)一文是对吴祥瑞文章的补充。熊步成认为,吴文所涉及的史实,有的尚有出入,有的语而不详。例如,吴文提到的胡思敬在京时收藏图书三十余万册,熊文认为是二十万卷,回赣后,陆续添置,才增至四十余万卷;熊文认为,胡思敬并未将所藏全部图书捐赠,仅捐十余万卷。此外,作者又对胡思敬的生平、藏书、著书、辑书等情况重新做了论述。辛增明在《胡思敬辞官著书》(辛增明:《宜丰史话》,宜丰县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1988年2月编印)一文中论述了胡思敬为官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关心民情以及积极致力于收藏和编辑典籍的事迹。王

紫林在《江西省通俗图书馆成立年代考证》(《江西图书馆学刊》,1989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1912年胡思敬捐书之时,江西省还没有一所省级公共图书馆。因此他提出,胡氏所捐之书很可能是给了建馆较早的通俗图书馆。王书红在《退庐图书馆始末》(《江西图书馆学刊》,1995年第4期)一文中,详细地叙述了退庐图书馆从开始创办一直到停办的整个过程,记载了退庐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及其后来的归宿。作者认为,胡思敬捐书创办江西图书馆(即退庐图书馆的前身)是出于无奈,是不得已之举。王书红的另一篇文章《胡思敬藏书综考》(《江西图书馆学刊》,1996年第3期)则对胡思敬藏书之数进行了考证,认为胡氏所捐的十万余卷图书基本上是其藏书的全部。作者还对胡氏藏书的归宿进行了考察,认为胡思敬根本没有捐书给所谓的江西省立图书馆,而是可能捐给了退庐图书馆的前身——江西图书馆(或称江西全省图书馆)。且胡氏所谓的“捐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捐书,即把书捐赠出来,而是把原本属于他个人使用的藏书,通过图书馆,供公众阅览,他本人仍然是书籍的主人。包礼祥在《胡思敬的刻书思想》(《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胡思敬是近代颇有成就的出版家。在刻书过程中,他不但注重校刻质量,而且有着强烈的成本意识。其刻书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即为乡贤续命,扬气节、正人心。这与当时重学(辑刻者所尚之学)、重版本(宋元本或精善本)的出版主流有异有同,而与少数遗老重气节、表乡里的思想相同。钱鹰飏、朱小宁、廖浩然等在《寻觅江西民间藏书家》(《信息日报》,2004年7月7日)一文中介绍了胡思敬的生平及藏书情况,叙述了胡氏藏书的归宿。认为胡思敬根据藏书编辑的《豫章丛书》是极有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料和文献资料。

胡思敬辑刻的《豫章丛书》是一部颇具地方特色的文献著作汇编,它以收书丰富、著录翔实、考订精审为世所推重。不少学者对胡思敬与《豫章丛书》进行了专题研究。喻剑庚在《简说胡辑〈豫章丛书〉的特点》(《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胡辑《豫章丛书》是研究江西地方史的一部重要文献,极有史料价值。是书具有

选书严格、补阙辑佚,校刻精善、有利后学,资料集中、查检便利等三大特点。同时,作者认为,《豫章丛书》也有疏失之处,如未收词、曲等。肖玲的《〈豫章丛书〉校勘题识考析》(《江西图书馆学刊》1990年第1期)一文,主要从考析版本源流、评价版本优劣,考订作者生平、阐明学术源流,考辨《四库提要》内容、更正《四库提要》失误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胡辑《豫章丛书》时所作校勘题识的主要内容及特点。作者认为,胡氏的校勘题识内容丰富,涉及到了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实为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江西地方文献提要目录。其既是对《四库提要》的考订、补缺,又是对四库所录江西籍学人著作的翔实、系统的考辨及补正。胡思敬为搜集、整理、考订及保存江西地方文献所做出的功绩,是应予充分肯定的。姚公骥在《〈两刻豫章丛书题记〉序》(《南昌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一文中,介绍了陶福履、胡思敬的生平仕履及两部《豫章丛书》成书经过、内容特点。作者认为,胡辑《豫章丛书》具有贯通古今、别择精审、校勘细密等特色。安平秋在《让乡邦先哲的珍贵文化遗产代代流传——江西教育出版社推出〈豫章丛书〉整理本》(《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13日)一文中也论及了胡辑与陶辑两部《豫章丛书》的特点。作者指出,陶辑《豫章丛书》所收概属《四库全书》未收者,多为私刻本或家藏抄本、手稿,为当时的稀见之本,史料价值颇高。但所收之书集中于清代江西学人的作品,品种不多,也未明分种类。胡辑《豫章丛书》与之相比,所收之书时间跨度大、内容更为丰富。在收书原则、体例编排、校勘要求上也都有自己的特色。

三、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一) 研究思路

以往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为拙作的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背景知识,是本书开展的良好基础。但笔者认为,以往的研究对本选题的直接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尚留有较大的余地,无论是研究的广

度还是深度,都可以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掘。

胡思敬作为清末民初传统学术素养深厚的史家,有较多的史学著述传世,但学界对其史学的关注却很不够。就目前的情况,尚无一部关于胡思敬史学研究的专著,且专门性的研究论文也为数不多。除《戊戌履霜录》《盐乘》两部史著外,学界对《国闻备乘》《驴背集》《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审国病书》《大盗窃国记》,以及编选、刊刻的《问影楼舆地丛书》等著作的研究均处于空白状态。可以说,胡思敬史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同时,对胡思敬生平及思想的研究也仍然较为薄弱,有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考察。例如,在胡思敬与张勋复辟的关系问题、胡思敬任职御史期间的政治表现、胡思敬在清末新政过程中的思想与活动等方面的研讨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为全面而深刻地理解胡思敬史学的个性特质,他的思想特征、价值取向及其历史影响等方面的内容还必须更为深入具体的阐释。

本书的写作目的,主要就是在充分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胡思敬的生平、史学与思想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进一步研究,尽可能地揭示其作为一位儒家士大夫的历史存在意义。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以胡思敬为个案进行研究,力图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广阔历史背景下,围绕传统文化向近代新文化转型这一中心问题,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与新、旧史学思潮和人物的比较观察,阐明胡氏史学与思想的个性特质及其历史影响。胡思敬作为一名完全坚持儒学传统思想、恪守旧的文化理念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历程与其史学活动之间的某种内在关联性,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资料方面,笔者尽力搜集胡思敬的史学著作及散见于各处的其他著述,同时大量查阅胡思敬友人的著作及相关史料,并对各种史料进行认真的考辨、梳理,在较为广泛地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适当地使用一些野史笔记以为参证,力图使本书研究建立在较为扎实的资料基础之上。总之,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厘清胡思敬生平,分析其著作,总结其成就,发掘其思想,为学术界全面认识胡思敬提供助力,也为清理近代史学遗产尽绵薄之力。